

经济管理 | 专著

Empirical Research of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Resident Income and Happiness Index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过程中

# 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 动态演变机理实证研究

吴丽民◇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Empirical Research of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Resident Income and Happiness Index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  
动态演变机理实证研究

吴丽民◇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动态演变机理实证研究 / 吴丽民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8-09333-0

I. ①经… II. ①吴… III. ①居民收入—关系—幸福—指数—研究—浙江省 IV. ①F126.2②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2298 号

## 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动态演变机理实证研究 吴丽民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杜希武                                                                                                            |
| 文字编辑 | 魏文娟                                                                                                            |
| 封面设计 | 俞亚彤                                                                                                            |
| 出版发行 | 浙江大学出版社<br>(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br>(网址: <a href="http://www.zjupress.com">http://www.zjupress.com</a> ) |
| 排版   |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
| 印刷   |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张   | 16.25                                                                                                          |
| 字数   | 262 千                                                                                                          |
| 版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308-09333-0                                                                                         |
| 定价   | 3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序

快乐与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而且原本就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20 世纪初期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把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掩盖或者混同起来了。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国民的快乐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有提高,这种增长不完全是无意义但起码也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近年来,体验经济学提出的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对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的终极目的意义,不仅指明了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方向,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人类,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GDP)马首是瞻的偏向,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吴丽民博士是我们学院最早引进的一批博士之一。2004 年年初她从德国培训回来后,我们便开始了合作实证研究的幸福之路,至今已有八年多。八年来,我们一起合作开展了对浙江省不同人群幸福指数状况的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幸福状况、高校教师与其他人群幸福指数的差异,以及开展了对婚姻、性别、性格、职业与幸福指数的关系研究,以及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等。期间,我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快乐与幸福理论学术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一部。2008 年受浙江日报社的邀请,我与吴丽民博士一起参与了浙江省幸福小城镇评比活动,期间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通过随访材料与调研数据,吴丽民在本书中对浙江省小城镇的幸



福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发现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中间传导变量的存在,并提出了以幸福视角划分消费类型并建议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转向引导居民的可持续增益幸福型消费角度。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合理调整消费结构,即增加可持续增益幸福型消费的比例,适当限制有限增益幸福型消费和期望幸福型消费,并尽可能地杜绝减幸福型消费。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与理论指导。本书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发现浙江省小城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尽如人意的的问题。本书从幸福的相关理论机理入手,着重对幸福指数测评的方法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以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为实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把书的落脚点放在构建科学幸福观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策略方面。本书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吴丽民博士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研究积累与悲天悯人的学者情怀。

写于此,不禁让我想起凯恩斯在 1932 年发出的惊世预言:经济问题可望在 100 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那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什么呢?是快乐与幸福。祈望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突围的人们从此书中获得真知,祈望所有向往幸福、研究幸福的人们阅读此书。

陳惠雄

2011 年 9 月于杭州

# 前 言

幸福研究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行进的：从哲学思辨“幸福是什么”开始，继而探究幸福从哪里来？什么会影响到幸福？如何测量幸福？最后的落脚点必然是如何获得幸福？1974年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经济过热发展也促使冷静的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获取最大财富还是获得幸福生活？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的发展路径是否为最优选择？现有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持续进行？在获取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有哪些失败的经验要引以为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实证探析在浙江省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如何变化？不同性别、年龄、性格、婚姻、学历、职业的居民，其幸福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传导路径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获得幸福生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成为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成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成为行政和立法的道德准则。

本书主要分八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是导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发展悖论：经济有发展、生活有改善、幸福无提高。在GDP中心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太多的生态成本、资源成本、社会成本和人性的成本。这些都不得让我们冷静下来开始反思：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本书导论部分对收入与幸福复杂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分析了GDP与犯罪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大量的数据显



示,经济发展之路偏离幸福之路越来越远了。

第二章是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研究的理论综述。该部分首先对幸福概念进行界定。并归纳出“幸福拓展木桶原理”。即幸福影响因素有层次的区分、影响效果有阶段特色、各因素之间有结构差异。幸福影响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特性的物质因素;另一类是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特性的精神因素。因此,对于幸福因素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幸福影响因素的特性是什么,如果短板在于物质因素,则找出短板并加长之效果较好,相反,如果短板在于精神因素,那么更需要注意的是要发挥你的长板,而不能再紧盯短板不放松。也就是说,有时需要“补短”,有时需要“扬长”。

其次是从哲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对幸福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由收入影响幸福的必然论、怀疑论、拓展因素观推演出本书的基本理论假设——“中间变量观”。并提出“收入—中间变量—幸福指数”三元链理论模型。收入通过对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幸福指数的理论构想可以从理论上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突破传统理论对“收入—幸福”传导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使收入分配对人民幸福指数的影响途径、影响效果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正确树立财富观念,特别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持续增益幸福”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章是对幸福指数测评方法综述。首先对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的幸福指数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对幸福指数进行测评的理论依据。其次是对幸福指数调查表的设计及主要因子进行筛选,共筛选出六个层次 12 个具体指标的两级幸福指数影响因子。个体状况、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工作状况、社会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这六个由内至外、逐级放大的因子圈共同影响着幸福指数。最后对幸福指数调查表测量学特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和结构效度。

第四章对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浙江省小城镇居民总体幸福状况;幸福指数动态演变规律;居民幸福状况的年龄分布、地区分布和学历分布。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小城镇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的幸福指数总体水平较高,且对未来幸福预期水平较好。不同年龄、地区、学历

居民的幸福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应特别关注高学历居民的幸福状况。

第五章是对浙江省小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分析。主要分析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幸福指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收入状况居民幸福感影响因子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小城镇居民中,幸福指数与收入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存在一个门槛现象,即超过某个收入界限以后,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指数的提升效果会弱化甚至会有负效应现象的出现。不同收入状况居民对幸福感影响六大因子的满意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

第六章是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主要分析职业与幸福指数;工作与幸福指数;婚姻、性别与幸福指数;性格与幸福指数;教育与幸福指数五个方面。

第七章是构建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动态演变模型,并对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及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收入状况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存在,提高收入仍然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举措。除收入外,社会状况、个体状况对幸福指数也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对幸福指数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性。即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个体状况、社会状况等因素为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且间接影响力要高于直接影响力。幸福影响因子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即个体状况和社会状况之间也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八章是构建科学幸福观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策略选择。提出提高收入与幸福指数转换率,提高收入与个体状况、社会状况之间的转化率两条路径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策略。本书最后以幸福视角分析消费结构,并以可持续性和幸福增减性两个维度对消费进行类型划分,将消费划分为可持续增益幸福型消费、有限增益幸福型消费、期望增益幸福型消费和减幸福型消费四个类别,在详细分析四类消费与幸福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持续增益幸福型消费的公共政策选择。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 论 .....                      | 1   |
| 第二章 收入与幸福指数关系研究的理论综述 .....         | 12  |
| 第三章 幸福指数测评 .....                   | 28  |
| 第四章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分析 .....           | 48  |
| 第一节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总体幸福状况 .....           | 49  |
| 第二节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动态演变规律 .....       | 53  |
| 第三节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的年龄分布 .....        | 55  |
| 第四节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的地区分布 .....        | 61  |
| 第五节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状况的学历分布 .....        | 70  |
| 第五章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分析 ..... | 80  |
| 第一节 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幸福状况比较 .....           | 81  |
| 第二节 不同收入状况居民幸福感影响因子状况比较 .....      | 89  |
| 第六章 浙江省小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102 |
| 第一节 职业与幸福指数 .....                  | 102 |
| 第二节 工作与幸福指数 .....                  | 115 |



|        |                                   |     |
|--------|-----------------------------------|-----|
| 第三节    | 婚姻、性别与幸福指数 .....                  | 142 |
| 第四节    | 性格与幸福指数 .....                     | 160 |
| 第五节    | 教育与幸福指数 .....                     | 173 |
| 第七章    | 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动态演变模型构建 .....           | 209 |
| 第一节    | 浙江小城镇居民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209 |
| 第二节    | 传统与三元链幸福指数理论模型比较及实证检验 .....       | 214 |
| 第八章    | 构建科学幸福观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策略研究 .....       | 223 |
| 第一节    | 提高收入与幸福指数转换率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策略<br>..... | 223 |
| 第二节    | 构建可持续增益幸福型消费公共政策 .....            | 227 |
| 主要参考文献 | .....                             | 241 |
| 后    记 | .....                             | 248 |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 GDP 为核心评价指标。然而,经验表明,GDP 指标体系无法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民生活质量,有时,GDP 指标还会引致不良的发展路径。实践表明,国家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和个体在追求财富最大化过程中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高昂的生态成本、资源成本、社会成本和人性成本,所有这些决非 GDP 数字可以充分表达的。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将原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表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取代单向度的经济增长而纳入国家发展视野,这一过程中的国民幸福增长则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1990—2009 年的 20 年间,从 1510 元增加到 17175 元,增长了 11 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 686 元增加到 5153 元,增长了 7.5 倍<sup>①</sup>。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很多人感觉到,虽然现在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了,然而并没有比以前幸福多少,反而有居民感觉幸福指数降低了。根据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的消费者调查数据,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 10 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幸福指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



数 1994 年为 69 分,1997 年达到 71 分,2004 年却降到了 67 分<sup>①</sup>(100 分为满分)。收入增加了,但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样增加。这种更多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就是“收入幸福悖论”的表现,或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2001)。

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大的贫富差距、更紧张的生活节奏、更多的欲望无法满足、更大的活动空间造成的亲情缺失,等等。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反思 GDP 与幸福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关系的维度、强度与跨度又如何?到底是 GDP 还是国民的幸福感是国家政策的终极追求?

## 一、一个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经济有发展,幸福无增益

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创新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空前增强,然而,蓦然回首,却发现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发展悖论——经济有发展,幸福无增益。我们现在可以用 20 年的时间创造过去用一个世纪才能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在改善幸福水平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 GDP 为唯一评价指标。然而,历史经验表明,GDP 指标体系无法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民生存质量,有时,GDP 指标还会引致不良的发展路径:国家追求 GDP 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个人追求收入最大化。为此,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高昂的生态成本、资源成本、社会成本和人性成本,而所有这些决非 GDP 数字可以充分表达的。

我国的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生态成本太大了,以至于许多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但人们看着被污染的生态环境,喝着被污染的水、吃着不安全的食品、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幸福感从何而来?不仅如此,如果任由现

---

<sup>①</sup> 资料来源:《百姓:幸福在哪里?幸福指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国际金融报》,2006 年 9 月 14 日。

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下去,中国的人均资源较少与经济发展过快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当 GDP 增长超出资源承载力时,经济发展和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就会受到阻碍。

### (一)个体生存环境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在个体生存状况方面人们面对的是更紧张的生活节奏、更多的欲望无法满足、更大的活动空间造成的亲情缺失、更少的闲暇生活、更多疾病(特别是流行病)的威胁。

### (二)自然生存环境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在自然生态状况方面人们面对的是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过度采伐森林资源、退化、沙化的原始草原、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的天然湿地、污染严重的海洋资源、匮乏的优质水资源等。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显示,我国有1/3的国土生态环境处于差或较差水平;森林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沙尘源;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仍很严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对农田的生产力和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沿海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海域总体污染状况仍未好转;荒漠植被的过量利用和内陆河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荒漠植被和荒漠区绿洲的生态退化;城市绿地面积不断扩大,但城市水资源短缺,城市绿地面积小、功效差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脏、乱、差”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优质水资源贫乏,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水量的1/4,相当于美国的1/5,俄罗斯的1/7,加拿大的1/48,世界排名110位,被列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家之一。据水利部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46个重点城市中,45.6%水质较差,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重点水域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 (三)社会心理环境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在社会生存状况方面人们面对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大的心理压力、更大的贫富差距、更严重的社会公正缺失;这些都导致人们的心理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挑战,如我国的抑郁症发病率为3%~5%,目前已经有超过2600万人患有抑郁症。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大城市的白领们在高压力、高竞争的环境下迅速成为此病的高发人群。我国有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与心理应激相关的疾病患者占人群的5%~10%,身心疾病、心理障碍已成为多发病、常见病。<sup>①</sup>如果说自杀是解除最大痛苦的一种手段,我们看到,在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自杀率也在提高,世界上每30秒就有一个自杀者,据统计,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是中国第五大主要死亡原因,同时也是15~34岁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sup>②</sup>。

中新网北京2010年4月28日报道了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为5.6%,物质滥用障碍为5.8%。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sup>③</sup>。2010年5月20日《光明日报》一篇《成人精神障碍均可发生于儿童青少年》的报道称,在我国,近五年资料显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3.97%~19.57%,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尤为凸显。这些都表明,精神障碍已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存在偏差?显而易见,GDP中心论误导着人类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htm?fr=ala0>

② <http://baike.baidu.com/view7062.htm?fr=ala0>

③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4月28日22:41。

偏离幸福之路越来越远。人类的终极目标不是收入而是幸福生活。那么,对金钱与幸福关系的重新审析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 二、金钱与幸福:对 GDP 中心论的深刻反思

当人们还没有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时候,解释为什么不幸福是很容易的。但要解释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为什么不幸福却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人不幸福的原因已经不能用财富短缺来解释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财富必然导致幸福”假说是个伪命题。这不禁使我们思考,既然财富不必然导致幸福,是不是财富对幸福无能为力呢?为什么财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财富是如何影响幸福的?

### (一)GDP 中心论

回顾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发现,古典经济学把“幸福研究”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然而,由于幸福的主观性与不可测量性,使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幸福”转移到“财富”。如汤普逊在 1822 年完成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精神学派由于主张只依靠精神力量就可以获得幸福而具有唯心特性,因此被抛弃在主流经济学界之外。机械学派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由此可见,机械学派研究的主题也与幸福越来越远。而西尼尔(1790—1864)则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自 18 世纪 70 年代亚当·斯密开始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就被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增加国民福祉的最好方略。到马歇尔时期,主流经济学则把研究的目标全面转向了经济增长。经过庇古、凯恩斯,再到萨缪尔森,这一方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经济增长中心论与 GDP 中心论大致反映了这一主张。



## (二) 收入与幸福关系

著名经济史专家、南加州大学教授 Richard Easterli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对 20 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通常在一个国家内, 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 但是如果进行跨国比较, 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Easterlin 根据对 1946—1970 年美国资料的跨时分析得出的结果也颇令人困惑: 尽管这期间平均美国家庭的收入增加了 60%, 但这并没有使美国人的快乐程度明显增加。1947 年年底, 大约 42% 的人表明他们非常快乐, 而到 1970 年, 也只有 43% 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快乐。

自“收入—幸福悖论”提出之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幸福”这一传统经济学论点提出质疑, 并通过各种实证与理论分析方法加以验证。此阶段的研究有两个方向: 一是验证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存在伊斯特林悖论; 二是该阶段研究得到四种不同的收入幸福之间的关系。

### 1. 收入与幸福之间负相关

有非常多的实证研究结论均支持收入与幸福负相关的结论, 如黄有光认为, 金钱既不能买到幸福, 也不能买到生活质量。赚钱比赛是个人非理性选择的结果, 这一非理性选择不仅不能提升幸福指数反而会因为过度竞争、资源浪费等负效应而降低幸福指数。黄有光通过对东南亚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导致人们幸福指数下降的现象进行分析, 并提出“快乐鸿沟”的概念。1957 年, 英国有 52% 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 但到了 2005 年幸福比例却只有 36%, 而此时间段内, 英国的国民收入提高了 3 倍。荷兰的维尼胡温 (Veenhoven, 1994, 2004) 教授长期进行全球快乐指数调查研究, 并提出: 近年中国 GDP 高速增长过程中, 国民幸福指数略有下降。这些实证研究都证明了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负相关性。

### 2. 收入与幸福指数无关论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 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力度非常有限, 如新加坡

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 82.4 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 16.4 倍,但这两个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却一样,日本经济腾飞使居民收入水平上升的速度非常快,但其快乐水平则在 59% 左右波动,没有上升的趋势,这些统计数据都表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相关的研究还有卡莫尼斯(R. A. Cummins, 1998),比较了全球不同国家人们的幸福水平,发现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其国民的幸福却没有出现高增长;布兰克福劳尔与奥斯瓦尔德(D. G. Blanchflower & A. Oswald, 2000)从微观角度探讨并得出结论:如果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人们的幸福程度没有随收入增加而提升。

### 3. 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呈倒 U 形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基本生存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收入与幸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不但不再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代表人物有塞利格曼)。

### 4. 幸福影响收入

狄纳(E. D. Diener, 2007)通过对修女的一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幸福的人可以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健康状况与寿命等,同时得出结论认为,幸福感会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的增加不一定可以提升幸福感。

## 三、GDP 与犯罪率

犯罪率高低是评价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对犯罪原因的分析也是犯罪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在犯罪学研究的历史中,最早是从人类学角度把犯罪现象归因于生物遗传、自由意志选择或者生理特征等因素。其后,社会学的出现为犯罪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代表人物意大利的菲利(1884, 1901)提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犯罪行为是一定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因此主张立法者应当改造社会环境并采取经济和教育的方法预防犯罪”。经济学开始研究犯罪问题始于 1968 年 Becker, Becker 在其《犯罪与惩罚》